

鲁东学术文库

近代转型社会中的 集团与人物

赵慧峰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鲁东学术文库

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

赵慧峰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赵慧峰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6

(鲁东学术文库)

ISBN 7-5607-2996-7

I. 近…

II. 赵…

III. ①集团研究—中国—近代②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279.244②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069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125 印张 237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册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与职官	(1)
一、八股取士下的士林风气	(2)
二、职官的俸禄与廉政的渺茫	(9)
三、杨守敬所折射出的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遗漏.....	(16)
四、未入流的幕客集团.....	(29)
第二章 转型期的统治阶层	(37)
一、独揣一份清醒的经世派.....	(37)
二、“师夷之长技”的洋务派成员.....	(53)
三、四面出击的清流集团.....	(68)
四、纠缠不清的帝后党争.....	(79)
第三章 大变局中的峥嵘要角	(92)
一、肃顺与北京政变.....	(92)
二、奕訢与近代中国的矛盾纠结.....	(99)
三、甲申朝局中的利害人物	(108)
四、同光年间的张佩纶	(117)

第四章 西学东渐中的侨客与华民	(127)
一、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效应	(127)
二、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139)
三、一位驻外公使的意外收获	(149)
四、两种文化观照下的孙中山的道德情怀	(157)
第五章 身不由己与情难自禁	(167)
一、亦庸、亦狂、亦执著	(167)
二、吴佩孚的传统情怀	(227)
三、三元里上再说中国农民	(234)
第六章 无处安顿的游魂	(253)
一、裹挟在国民革命潮流中的周作人	(254)
二、人权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	(264)
三、无地自容的杨杏佛	(278)
后 记	(288)

第一章 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与职官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传统绵长。长期的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将我们的国家打磨得风格独特，色彩斑斓。回过头去，屏气凝神地审视我们的过去，会发现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一个宗法社会、一个等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选举社会。

社会是一个运动着的由人组成的结构体，它以一定的理念与制度将不同的人群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各司其职，平衡运转。中国古代的社会人群可以分为皇室、贵族、官吏、平民四个等级，其中平民一级又分士、农、工、商四种人群。在这个等级结构中，人群在纵向上是可以部分流动的，比如“民”的阶层可以上流到“官”的等级。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用以平衡阶级矛盾的手段。从汉代的察举、征辟，到三国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朝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才择官，选举几乎纵贯了中国社会的整个时段。尤其是科举选官，历 1300 年而不衰，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品位、文化导向以及结构秩序，都形成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广泛和复杂一言难尽，但我们可以择取一定的角度予以管中窥豹。下面我们从正考的、考中的、遗漏的、半途而废的四个时段，对选举社会中的人群进行审视。

一、八股取士下的士林风气

作为官员选拔录用办法,从隋以前的荐举到隋以后的科举考试,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无疑是一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但是,科举制度既然是一项封建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没有弊病,尤其是考试内容的选择,从唐朝至清朝就一直存在着“所学非所用”的问题。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科举制度更日趋败坏。为了适应统治阶级加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考试内容越来越朝着禁锢思想、束缚才智的方向发展,于是八股文在明代应运而生。清朝是在八股文弊端百出的情况下,继续沿用八股文选拔录用官员的。人们称这种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内容的选官方法为“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的弊端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暴露无遗。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已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八股取士与一代王朝衰亡的密切关系,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认为它“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成了明朝由盛转衰、由衰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承袭了明代即已千疮百孔的八股取士制度,并伴随着封建王朝走向穷途末路的历史,对其进行了多年的“发展”和“完善”。进入近代以后,八股取士的弊病比前期暴露得更加明显,其对社会的危害也更为严重。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缘于诸多因素,八股取士制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其对近代社会的影响,概括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摧残士子,造成了近代人才的缺乏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竞争激烈,适者生存。不论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还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这

场竞争中,中国不是一个成功者。“中国人民四万万,倍于欧洲十六国,此地球未有之国势也;而愚暗无才,虽使区区小国,亦得凭陵而割削之。”这究竟是为为什么?“推原其故”,人们的结论是“毕八股累之”。^①

封建统治阶级是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根本矛盾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按照社会前进的需要确定自己的人才标准。八股取士不是选拔人才的良策,而是毁灭人才的罪魁。它用八股文、楷书等把士子困住,又用功名利禄将他们牢牢吸引。考试中得之则荣,失之则辱,而考试成败的关键,是看八股文章的好坏。于是在八股取士制的驱使下,无数士子自“束发成童,即期以富贵。所尚者,非通经也,应举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禄之术也”^②。学非所用,士子们受尽寒窗之苦,却难以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所以读书人一旦选择了应试这条路,就要皓首穷经,终生不徙业。失败了未免绝望,成功了也只是个未辨菽麦的白痴,因此,“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③,近代人才的缺乏,也就不言而喻了。

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从强烈的忧患意识出发,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认识到八股取士与人才危机的关系,得出结论说:“我国人自童年至壮年,困之以八股”,“目不通古今,耳不闻中外,以致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乃至市井无才,田亩无才,列肆无才”^④。康有为也禁不住感慨,士大夫为国命所

① 以上引文见徐致靖《请废八股疏》,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② 魏源:《明代食兵政录叙》,载中华书局编《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3页。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34页。

④ 徐致靖:《请废八股疏》,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托,若以此百万人从事科学、政艺,国家何患无才,而士子们把全部精力花在文法上,渐成废才。八股取士就是一个无底深渊,吞噬淹没了又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康有为还告诫人们:近世各国以政艺人才相竞争,强者兴,弱者亡,若再行八股取士,即与救亡图存大计成为南辕北辙,后果不堪设想。

(二)败坏士习,加深了近代政治的腐败

士风日下,政治腐败,曾是制约近代社会的重要问题。时人管同感言:“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①士人的心志不是“学圣希贤”、“尊主庇民”,而是热衷“奔走于利禄之场”。官吏们则更是渎法贪冒,柔靡浮没,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和八股取士不无关系。

“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八股时文的烦琐空疏,决定了八股取士对人才的录用不可能真正以才论之,有才者可能不通,无才者则可以通过各种不正当途径达到榜上有名。如此,便出现了关节、顶替、条子、枪手等作弊现象,使礼义廉耻丧失殆尽。正如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所说:“科举之法,以八股制艺取士,实不足据。况有司故事奉行,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而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士子是潜在的官吏,这些心术不正的人一旦得中通籍,便成为封建官场中的成员。他们如法炮制,奉此投机取巧秘诀参与政事,从而使吏治败坏,政治腐朽。长此以往,末学滥进,豪杰灰心,士习政风便会每况愈下。

另外,由于众多士子趋于科举一途,而录取名额却又少得可怜,大约是“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

^① 管同:《说士》上,载《因寄轩文二集》卷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①。士子的录取机会是很少的。因此，那些把考试当成毕生职业而又终生考不取的生员，便形成了一个数量不小的阶层。他们既没有取得为官的资格，又不肯放下架子去当百姓，其中有少数人进入衙门充当了幕友书吏，或做了私塾先生。而更多的人则游手好闲，甚至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欺压百姓，从中渔利，成为败坏社会政治的蛀虫。可见八股取士不但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反而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途。难怪严复说八股取士有三大危害，一锢智慧，二坏心术，三滋游手，并认为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

（三）窒息思想，延缓了近代民主改革的进程

封建统治阶级的考试目的不以选拔人才为主，而以培养奴才为重，科举考试从来就是对知识分子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王朝实行八股取士的目的是为了束缚、禁锢士子的思想，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为清王朝培养和造就忠实的统治工具。在这方面，可以说清朝统治者是成功的。

士子欲进入官场须经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八股文的题目限于四书五经，八股取士制以其特定的程序和考试内容，将热衷于科举考试的士子的心智限定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氛围之中。不事举业的人，也在科举的影响下，同样以四书五经为教科书，以至于凡读书人，自束发读书，即日诵五经四子之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封建纲常礼教便自然而然地灌输到士子的头脑中。他们以古为好，言必称孔孟程朱，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毫无创造精神，其思想方法始终跳不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框框。可以说，八股取士对士子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百日维

^①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新时期一度宣布废八股，士子们暂时脱离了八股的羁绊，开始接触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之外，尚有如许多国”^①。这次废八股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却使全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豁然开阔，耳目为之一新，士习文风倏然一变，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八股取士对士子思想和学术空气的窒息。

八股取士对封建文人的束缚不仅体现在其考试内容的选择，还在于考试形式的烦琐。由于这种考试一来文法密，二来忌讳多，士子们稍不注意，便会违反考试原则和试卷格式，故他们在多年的举业生涯中养成了一种循规蹈矩的习惯。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麻木僵化，死守“成法”，反对任何新生事物。一旦有人试图对中国社会进行变革，他们便以“用夷变夏”、“违反祖宗成法”相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说，八股取士的确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正如康有为所言：八股取士“虽未尽足以育才兴学，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焉”^②。

总之，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讲，利用八股取士加强思想统治的政策是成功的。它不但是束缚士子思想的有效办法，而且是对于整个社会加强思想统治的有力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八股取士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罪的，它通过一种严格而死板的考试标准把程朱理学牢牢地稳固在正统思想的宝座上，钳制士子思想的发展，进而造成了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形成了一种“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的社会风气，极大地扼杀了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是近代政治变革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改良派可谓有切身的体会。在谈到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页。

②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八股取士与政治变革的关系时,他们不无感慨地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①

(四) 禁锢智慧,阻碍了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古代中国,曾以四大发明享誉全球,走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列。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我们的科技不仅失去了领先的地位,而且已远远落后于西方某些国家的发展水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也不是中国人不愿意学习自然科学,而是八股取士制度误导的结果。正当世界科学文化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聪明智巧之士,却穷老尽气,把心智、精力消磨于时文试帖楷法无用之事”^②,而天文算学,几成绝学。统治阶级通过八股取士制把儒家纲常、程朱理学奉为圭臬,甚至将它们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要人们放弃精神生活的正当追求,俯首帖耳地服从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天理”。这一宗教化、哲理化的禁欲主义腐朽意识,极大地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而且唯心主义理学与科学是对立的,科学需要实事求是地了解自然现象,研究自然变化的规律,使人成为战胜自然的主宰,而八股取士不允许科学触犯理学的统治权威。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科学的思维能力,善于探索和创造的智慧,统统被理学的迂腐淹没了。无法造就近代科学技术所需要的人才,无法使科学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又哪里谈得上科学的倡兴!

不遵循科学的教育规律,对学术进行人为的误导,势必影响人们正常的接受能力,造成科学文化的落后,这是毫无疑问的。除此

^①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之外,八股取士对科学文化发展的严重危害,更在于这种制度把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完全排斥于考试内容之外,养成了知识分子鄙视先进科技的恶习,从而使社会文化的发展呈现畸形。对此,梁启超指出:“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尤甚。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好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学些艰辛、迂远的科学呢?”^①的确,士子读书,自然要考虑物质利益,考虑日后的生活出路,统治者把物质利益同八股文捆在一起,而不把物质利益同科学文化连接起来,士子只有甘愿就范,把科学文化放置在一旁,弃如敝屣。谁学习自然科学,谁就失去了读书人的身份,就是舍本逐末,不务正业。这一宗教式的偏见,扼杀了读书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甚至导致了对自然科学的歧视,有所谓“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②之说。同治六年,监察御史张盛藻上书坚决反对用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术,理由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技巧,专心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③世人的观念如此,可以想象,科学的幼芽要冲破这顽固的习惯势力的排斥,该是多么不容易。

作为一种流传久远的教育制度,我们并不否认,八股取士也有它一定的存在价值,并非一无是处。它在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训练思维能力的集中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方面,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在世界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封建教育制度,其对近代社会所起的恶劣作用则是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63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页。

③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张盛藻奏折,载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明显的。许多人都曾指出过八股取士与民族危机的关系,认为“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①。1898年4月28日晨,光绪帝在中南海仁寿殿召见康有为,询及变法大计,在两个多小时的答对中,康有为力陈变法的必要,其中涉及最多的仍是八股取士制度。康有为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的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无以任今日之事变者,皆由八股致之。故辽台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以至胶州旅大威海卫广州湾亦莫不割于八股。”^②

这些话虽不免有忠君的色彩,但也的确言中了一些事实。

二、职官的俸禄与廉政的渺茫

经过科举程序的层层选拔,终于脱颖而出,进士及第,便完成了由士人到官员的角色转换,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无论封建体制多么荒唐、腐败,应该说都不会不对自己千方百计选拔出来的吏员怀揣一份希冀与热望。希望他们文能治国,武可安邦。当然,更希望他们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表率天下。廉政,应该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的梦想。如清代那种凭借严格的考试程序选拔出来的官员,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廉洁奉公了呢?廉政除了是一种美好的期望之外,是否一定的制度保障也是不可缺少的呢?

清初,职官俸禄一如其他各项法规、政策,基本上沿袭了明代之制。按照明代的惯例,清廷户部对各级官员规定了相当低的俸

① 徐勤:《中国除害议》,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② 赵丰田编:《康长素先生年谱稿》,1929年《史学年报》,第198页。

禄标准。清代的官员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共分九品十八级,各级官员都按照户部的规定领取俸银,京官外加禄米。此外,还有大量“未入流”的低级官员以及各级官府的办事人员,如衙役、长随等,他们或者能领到极少的俸银,或者干脆不发给俸禄。待政局渐稳,稍作喘息之后,从顺治四年至康熙八年,清朝统治者对官员俸禄作了几次大的调整,遂成定制。根据清朝《户部则例》卷七记载,现将清代官员每年的俸禄数额等项列表如下,以资说明。

清代官员俸禄一览表

品级 俸禄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正九品	从九品及未入流
每年俸银(两)	180	155	130	105	80	60	45	40	33.114	31.52
京官俸米(石)	90	77.5	65	52.5	40	30	22.5	20	16.557	15.75

这些标准自确立之日起不曾更改,一直坚持到清末。当时,中央各部的尚书、侍郎和统辖一省或二三省的地方最高级官员总督、巡抚,一般是二品、三品官员,只有极个别的属一品官,如此,这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每年的俸银只有130两到155两,最高的也不过180两,其他低级官员则渐次递减,收入更少。而且即使这不多的俸薪,有些官员往往还领不到全额。因为清政府惯于用扣俸、罚俸的方法来处分官员,如康熙初年,有的地方官在任仅二三年,而被罚的银两就相当于其二三十年的俸薪总和。康熙末年,山东全省的国库出现了几十万两的亏空,户部竟要求用全省官员的俸银来弥补这笔银两。此外,强迫官员“捐俸”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清代职官的俸薪本已不高,如此花样翻新的克扣更使官员的收入捉襟见肘。

封建官吏的俸禄作为一种制度,自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在

酬给方式上加以变革使之确立以来,比较而言,清代的职官俸禄标准可以说是历代最低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首先,因沿袭明代职官俸禄制度所致。清王朝建立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统治制度已相当成熟,统治经验也十分丰富,而满族在入关时,它的经济、文化状况都落后于被它占领的广大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因此,满洲贵族在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过程中,大量沿用了前一个朝代——明朝的各种制度。“清承明制”,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俸禄制度也不例外。明代由于吏道庞杂,冗员重叠,官员俸禄明显低于宋朝,清代因袭故明旧例,标准当然不会太高。其次,清初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国家财政难以负担过高的官员俸薪开支。清代的职官俸禄制度确立于顺治四年至康熙八年。当时,“天下幅帙初定,户口未集,官患于民少地荒,赋额未完;民患于官多赋重,供应弗给”^①,一时难以在动荡、凋敝的社会经济状态下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更多的赋税。而且每年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还要花掉大半国课。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各地反清势力如星火之火,军费浩繁,国库空虚,降低俸薪亦属无可奈何之举。最后,与康熙帝的为政原则及个人意志有一定的关系。康熙帝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一心想做一位“勤政爱民”的好皇帝。每当不得已时,就将职官俸禄一减再减,待政局稳定之后,他也无心改动大典定例。为了“使兵民得以休息”,康熙五十年,他还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尤其在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后,清政府的国库赋税收入每年就一直维持在四千万两左右,要为庞大的官员队伍增加俸禄也确实力不从心。如此,终清一代,职官俸禄始终保持着较低的标准。同时,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也是历史上贪污腐化、贿赂公行、需索陋规最为严重的王朝之一。那么,职官俸禄与为政廉洁之间,有没有一定的

^①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一八,道光七年(1827)刻本。

关系呢？应该说是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和国家赋税的增加，人们的收入也应有一个相应的提高。然而与上述结论不协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职官俸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一代不如一代地降低和减少，这是有悖于情理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为从政者所不堪忍受。合法收入的减少，势必导致非法索取的泛滥，政治腐败的加剧。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某些人的注意。

顺治元年，当朝廷规定官员俸禄仍照明代旧例折色支給时，有个叫任源祥的就曾上疏提出异议：“有明官制，上仿成周，而俸给则大远于古，数额既少，又折支焉，甚非养廉之道也。”^①此言并非没有道理，清代从一开始贪污之风就十分猖獗，康熙曾无可奈何地感叹：“部院无事无弊，大臣无人无私。外间之弊较内更多，朕知之久矣。”^②康熙时，曾派一名内廷的侍卫去某地铁索桥挂匾，当地督抚就送给他白银六千多两。^③不过是区区一侍卫，行挂匾之小差，居然能得到如此数目的银两，可以想见，当时的贪污贿赂已达到何等的规模和程度。

在贪污中饱、索取贿赂的“八仙过海”之中，征收火耗即为其中之一例。在征收各种赋税银两时加征火耗，这种做法在明代即已普遍推行。名义上，征耗是用以弥补倾熔征收赋税而得零星散银锭时造成的损耗，但实际征耗的数额已大大超过了这种需要，成为正赋之外的又一项附加税。这种附加税除极小部分用作补足损耗外，多余部分称为“耗羨”或“羨余”，不计入赋税总额，也不上交国库，而由征收赋税的地方州县官私自支配。清初，征收火耗是非法

①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一八，道光七年（1827）刻本。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〇，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③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